南梁史苑

Nan Liang Shi Y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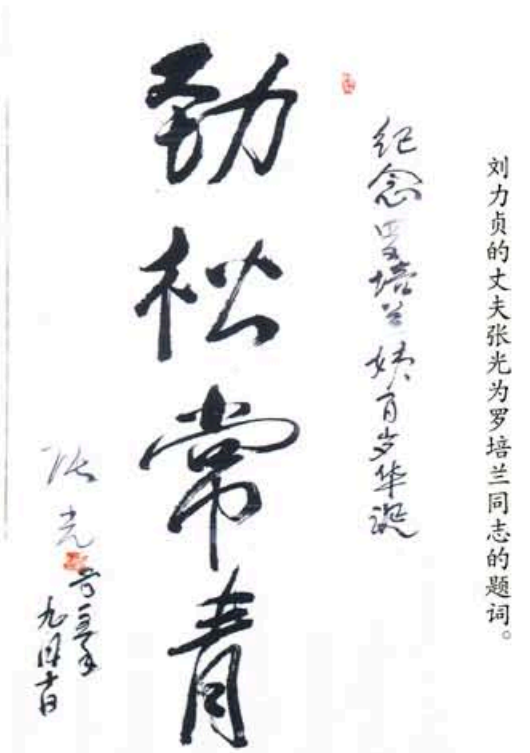
纪念罗培兰同志诞辰100周年

2015年第1期
总第8期

2015年9月16日，罗培兰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

刘志丹将军的女儿、原陕西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刘力贞为罗培兰同志的题词。

刘志丹将军的女儿、原陕西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刘力贞为罗培兰同志的题词。



刘力贞的丈夫张光为罗培兰同志的题词。

杨森烈士的外孙付乾龙为罗培兰同志书写的赠联。

目 录

Contents

【永远的回忆】

陕甘边革命的女先驱　　张万福　辛少波/02

战地黄花分外香　　雷学军/07

姐妹一样的情谊　　折兴发/11

听父母追忆习仲勋在陕甘边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朱新平　朱春宁　朱　红/14

怀念我的姨妈　　唐　林/22

【生平简历】

罗培兰同志生平　　/25

悼词　　/25

【深情歌颂】

赞罗培兰　　折兴发/28

罗培兰　　折兴发/28

南梁史苑

Nan Liang Shi Yuan

2015

第一期

总第8期

主　编

折兴发

本期责任编辑

白英明

主　办

中共华池县委党史办

准印证：（甘）Y1200018

地　址：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老城街3号303室

邮　编：745000

电　话：0934-5952587

电子邮箱：hcxwdsb@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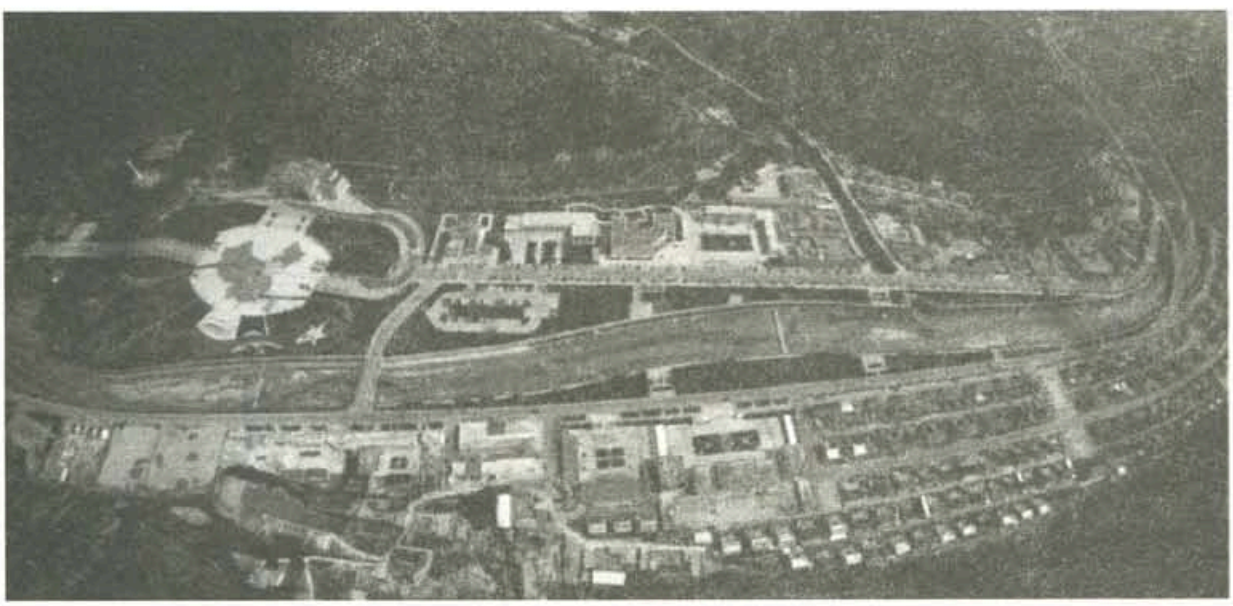
陕甘边革命的女先驱

——纪念罗培兰同志诞辰100周年

中共华池县委书记　张万福
华池县人民政府县长　辛少波

罗培兰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红二十六军优秀妇女干部、陕甘边区妇女杰出的代表，她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陕甘宁边区农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罗培兰同志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主要参与者。罗培兰1915年出生于陕西乾县注泔乡胡罗村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受五四新思潮影响，就胸怀远大理想。因为家里穷，父亲去世后，她和妹妹被地主拉去抵债，她不堪忍受地主的欺凌、压迫，从地主家偷跑出来。1933年10月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同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她性格刚强，胆大、细心，不久就调到了红二十六军经理处，在马锡五同志的领导下，从事中药材采购，军服、军鞋制作等艰难繁重的后勤供给工作。在工作中，年仅18岁的她一边组织动员妇女乡亲制作军服，一边学得一手好针线活，并练习骑马、打枪，成为闻名陕甘边区的女红军。她曾回



俯瞰南梁　　张步农　陈　明　摄

南梁革命纪念馆打土豪分田地群雕　　折兴发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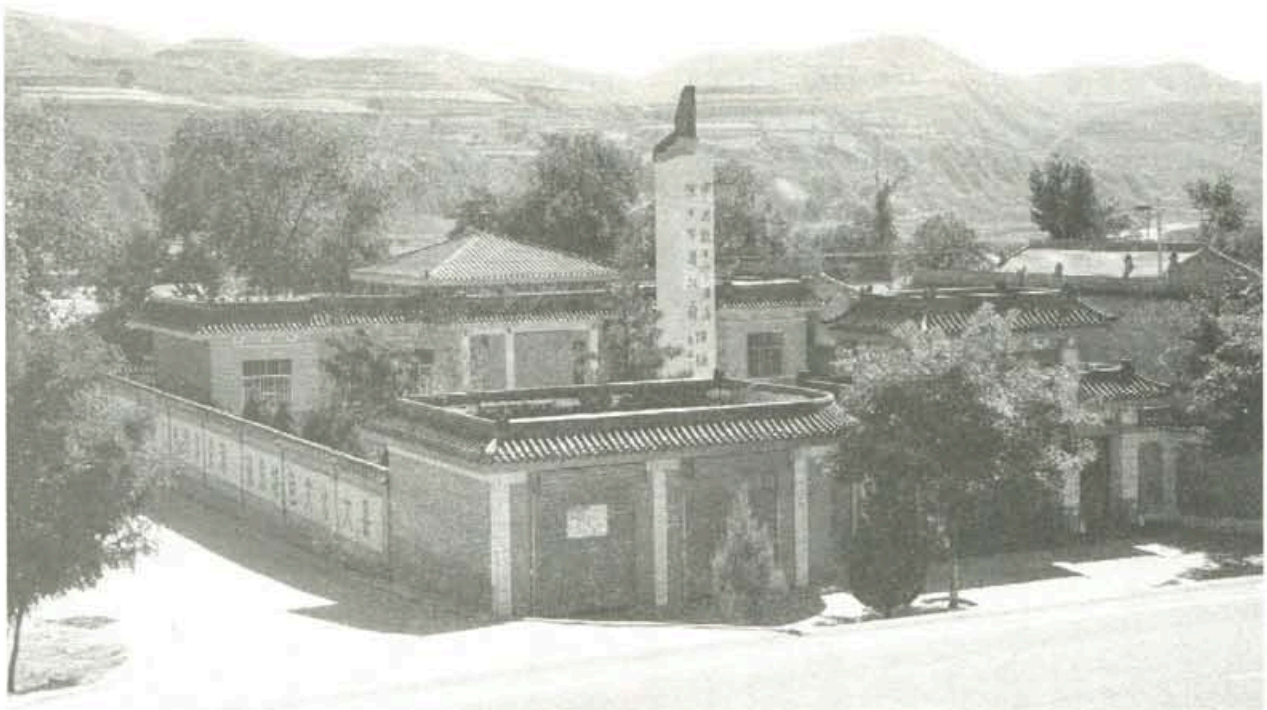
忆说，刘志丹同志率红二十六军打游击战、运动战，经常转战南梁、陕北和照金之间，但南梁是根据地的中心，习仲勋就带领我们南梁政府的十来个同志坚守。

罗培兰同志是陕甘边区妇女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妇女工作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重点工作之一。1934年，罗培兰来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甘肃省华池县南梁，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妇女工作。罗培兰自幼聪慧，能说当地方言，会干农活、做家务，遇敌能周旋。1934年6月，任陕甘边区政府妇女代表，负责妇女工作，主要任务是发动妇女参加、支援部队和政府工作，收集情报、抓敌特，做军服、军鞋，筹粮筹款。她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长高敏珍，列宁小学教师张景文，刘志丹同志的夫人同桂荣像男同志一样，一家一户地上门了解广大妇女的实际情况，帮助她们解决各种生产、生活困难，宣传革命真理，动员她们参加革命活动，组织她们做军服、军鞋、加工军粮，使白马庙的惠长英、牛望台的贾朝英、荔园堡的王继兰等南梁农村妇女走上了革命道路。经过艰苦卓越的工作，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正式成立，罗培兰被推选为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出席了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5年初，罗培兰任鄜甘县妇女主任。她经常走村串户，用拉家常的方式，做妇女

们的宣传、组织、动员工作，鼓励她们解放思想，自强自立，同封建势力作斗争，走出家门，解放自身，积极革命，深受广大妇女的爱戴。在马文瑞同志的领导下，很快打开了鄜甘县革命工作的局面。

罗培兰同志是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的主要组织者。1935年，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干扰，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展了错误“肃反”。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也面临着被抓捕。罗培兰在习仲勋的帮助下，到了基层游击队，逃过被抓捕杀害的劫难。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撤销了陕甘晋省，成立了陕甘省。1935年10月，罗培兰被任命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科长，支前工作团干事，负责联络、召集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及所属各级组织的人员到陕甘省开展工作。马锡五、杨玉亭等同志很快来到了陕甘省政府，组建了独立营。1935年11月底，新成立的陕甘省各级政权机构迅速投入到直罗镇战役的战勤保障工作中去。罗培兰带领支前工作团夜以继日地与群众广泛沟通，动员、组织群众成立运输队、向导队、担架队，开展筹款、征粮、运粮、收集敌情、肃清敌特、封锁消息、隐蔽部队、转运护送伤员等后勤工作，有力地配合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她回忆说：“在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里，中央红军来的同志对西北话听不明白，他们讲的南方话，根据地的群众又听不懂，群众信任我们陕甘边区政府来的同志，我们就做翻译。我们告诉根据地的群众：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中央红



河连湾陕甘宁省委、省政府旧址

军，中央红军是为根据地反第三次‘围剿’打仗。支前工作团的工作很快就顺利展开，组织了数百人的运输队、向导队和担架队，完成了及时运输军需给养、带路和转运伤员的任务。整个根据地对敌军封锁消息，我们陕甘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唱到：‘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亲人迎进来’，生动地再现了陕甘苏区军民在直罗镇战役中支前拥军场面，群众帮助隐蔽红军部队，敌军根本不知道红军主力部队就隐蔽在直罗镇附近。群众还帮助传递敌人动态情报，坚壁清野。陕甘边区根据地在家的青壮年不多，有的军烈家属中只有老人妇女儿童，仍然踊跃参加支前工作。宁愿自己受冻，也把仅有的被褥给伤员盖上，有的群众把自己的口粮都献给红军”。有效地后勤保障工作，确保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罗培兰同志是陕甘宁边区农业人才培养的主要先行者。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朱开铨同志任中共陕甘省委常委、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主席。由于在长征途中受过伤，在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中连续劳累，战役一结束就病倒了，当时，陕甘省委委派罗培兰同志护理他。在这期间，由中央红军罗梓铭同志当“红娘”，在习仲勋同志的鼓励下，罗培兰向陕甘宁省委汇报后，时任陕甘宁省省委书记的李富春批准了他们的婚事。他们喜结连理，成了陕甘宁省成立后的第一对革命伴侣。

1936年5月至1937年9月，罗培兰同志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四科科长。9月，由于她对工作严肃认真负责，由共青团直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10月，罗培兰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巡视团干事，协助朱开铨同志开展巡视团工作。1938年6月至12月，罗培兰同志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副科长。同年12月，朱开铨同志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副厅长，主管农业。这期间，他们看到陕甘宁边区耕地十分贫瘠，耕种方式很落后，老百姓除了自给自足外，余粮不多，为了满足部队粮食和物资供给需求，罗培兰和朱开铨深入广大农村，经过认真调查，仔细研究，多方论证，向边区政府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请求成立一所农业学校，以便培养农业方面的人才，提高农产品产量，充分解决军需供给。边区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1939年1月，任命朱开铨为农业学校校长，罗培兰为总务科长。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是当时延安的八所名校之一。他们夫妇二人带领大家边学习，便垦荒，种植粮食、蔬菜、瓜果、培植果树、喂养猪羊等。那时，罗培兰既要抓学校的全盘教学工作，又要抽空学习农业技术知识，忙得常常忘记给孩子做饭，她的两个女儿经常把同桂荣的家当作自己的家吃住。在他们的带领和同志们的努力下，学校当年实现了自给自足，还有一些富余的粮食和副食品，毛主席知道后，十分高兴，评价这是解决机关生活困难的一种很好的办法，给后来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做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罗培兰任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总务科长一直到

1945年9月，为边区的农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队伍。

1945年9月，罗培兰任陇东专员公署四科科长。1945年9月至1946年5月，朱开铨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罗培兰协助朱开铨做了大量地方工作，为守护延安西大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罗培兰先后在中原人民政府荣军管理处、江西省民政厅工作。期间她受到蒋家特务的暗算，她依然用残疾的身体，默默地支持丈夫工作。他们在革命道路上相互勉励、相互促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刻。

今天我们缅怀罗培兰同志，就是缅怀她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创建和陕甘宁边区农业的发展做出的不朽功勋。让我们继承和发扬罗培兰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弘扬“南梁精神”，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紧紧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努力工作，勇于奉献。

参考资料：

1、谷凌云，《战地黄花分外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2、刘力贞、张光，《纪念同桂荣》，陕内图批字（2012）007号。

荔原堡　　折兴发　摄

战地黄花分外香

——纪念罗培兰同志诞辰100周年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雷学军

2015年9月16日，是陕甘红二十六军优秀妇女干部罗培兰同志百岁诞辰。

罗培兰同志，1915年9月16日出生于陕西省乾县注泔乡胡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穷，父亲临死前想喝一碗米汤，都没等到出去讨饭的人回来就咽气了，用坑上唯一的一张破草席卷着掩埋了。父亲去世后，罗培兰和妹妹罗姓婉被拉去抵债，受尽了地主剥削、压迫，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弟弟小小年纪，就被迫外出流浪讨饭。邻村地下党周嫂见罗培兰十分可怜，便想办法带她从地主家偷跑出来，到陕北参加了穷人的队伍，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从此，罗培兰成长为一名坚强的红军女干部。

1933年秋，她参加了红二十六军解放甘肃合水县的战斗。1934年春，她来到甘肃省华池县的陕甘根据地中心南梁地区，在“陕甘边区委员会”（群众称“南梁政府”）习仲勋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曾任鄜县妇女委员会主任。

南梁革命纪念馆烈士纪念碑　折兴发　摄

罗培兰同志在陕甘边区委员会（南梁政府）做妇女工作时，习仲勋派人，将被敌人追捕的刘志丹的父亲及夫人同桂荣、女儿刘力贞接到南梁与罗培兰住在一个窑洞，一起做妇女工作。主要任务是发动妇女参加、支援部队和政府工作，收集情报、抓敌特，做被服、鞋袜，筹粮筹款。罗培兰同志是本地人，经常走村串户，深入实际，她态度和蔼，诚恳待人，在地里同老乡一起种庄稼，看到别人纺纱织布，也能熟练地搭把手，用浅显的本地话，把革命道理讲给婆姨、女娃们，像拉家常似的，顺便就把情况摸清了。

战争年代，环境艰苦，敌强我弱，刘志丹同志率领红二十六军，在照金、陕北、南梁一带打击敌人，习仲勋同志带十来个同志，坚守南梁根据地。罗培兰同志一方面刻苦学习打枪、骑马，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另一方面与群众打成一片，做好群众工作。很快，南梁根据地的群众都知道，南梁政府有一个会打枪骑马，又泼辣能干的女红军。

一次罗培兰同志外出执行任务时，看见前面有二、三个穿着敌人军装的人，骑着马过来了，心想山上的消息树没倒，大白天哨兵也没有报警，怎么让敌人摸到根据地来了，就边跑边把手摸到腰间的手枪上，只见来人骑马紧跑，还叫着："小姨子，别开枪，是我呀！"原来是刘志丹同志回来了（罗培兰与同桂荣亲如姐妹，一直以姐妹相称），罗培兰看清楚后，才松了一口气。刘志丹夸奖她："小姨子，你的警惕性还真高啊！"

1935年，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根据地开始"肃反"，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部被扣押，南梁政府干部也面临着被抓捕。习仲勋同志对罗培兰说："你是女同志，他们刚到，不认识你，你赶快跑吧，保存一个是一个，但不能跑到敌人那边去，否则以后就说不清了。"罗培兰同志到了基层游击队，因此逃过了被抓捕的劫难。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罗培兰同志执行完任务，骑着马在回来的路上，后面忽然有马鸿逵的骑兵追了上来，一边追一边叫："抓住她，抓住她。"罗培兰同志紧拉缰绳，策马快跑，一面向马匪开枪还击，后面的敌人穷追不舍，眼看快被追上了，这时边区的同志们闻讯冲了上来，打退了马匪。后来领导们都

说："你一个人外出工作太危险。"罗培兰同志说："为了完成任务，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危险。"

1936年，罗培兰同志在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任民政科科长，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47年初在陕甘宁边区政府、陇东专署工作，1947年初胡宗南进攻延安，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罗培兰同志和时任陕甘宁边区巡视团主任的朱开铨同志，带领全家，按中央指示，撤离延安，渡过黄河，前往山西省临县三交镇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后参加中央土改训练班。1948年4月迁往河北平山县小米峪村，距西柏坡只有几华里，准备南下江西。1949年5月南下。

罗培兰同志的丈夫朱开铨同志，是江西瑞金人，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35年长征到达陕甘后，曾任中共陕甘省委委员、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省委书记是朱理治，省委委员有李富春、朱开铨、萧劲光、李一氓、郑自兴、揭俊勋。由于在长征途中受过伤，在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中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战役一结束朱开铨同志就累病了，陕甘省委当时委派罗培兰同志护理他。习仲勋同志问罗培兰："听马锡五说，给你介绍了一个中央红军的同志，叫什么名字？人怎么样？"罗培兰说："是朱开铨同志，在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认识的，现在是省政府主席，就是他接收了我们陕甘边区政府的干部。中央红军来的罗梓铭同志要我和朱开铨同志结婚。"习仲勋同志说："是朱开铨同志啊！我们已经见过面了，他现在累病了，你要照顾好中央红军来的同志，他们长征吃了很多苦，他对你好，那就可以考虑。"

后来陕甘省扩大为陕甘宁省，习仲勋同志又对罗培兰说："朱开铨同志在工作方面信任和使用陕甘边区的干部，我看他坚持原则，为人正派，你同意与他结婚就向省委汇报。"仲勋同志的话，对罗培兰同志触动很大。

时任陕甘宁省省委书记是李富春，省政府主席是马锡五，朱开铨是省委委员、省政府党、团书记、副主席兼土地部长和裁判部长。罗培兰同志就将与朱开铨同志结婚之事，向李富春同志作了汇报。很快，李富春同志代表省委批准了朱开铨同志与罗培兰同志的婚事，并把马锡五、罗梓铭、肖劲光、

南梁烽火（雕塑）　王　杰　摄

李一氓、蔡畅请来，商量办喜事。由朱开铨同志花两块银元办了三桌酒，李富春同志主持婚礼，并代表省委、省政府讲话。罗梓铭代表中央红军来陕甘宁省工作的同志讲话，马锡五代表陕甘边区来陕甘宁省工作的同志讲话，蔡畅代表妇女同志讲话，肖劲光代表驻陕甘省的红军部队讲话，习仲勋同志赶来祝贺。李富春同志祝酒时说："朱开铨同志和罗培兰同志，是陕甘宁省机关第一对结婚的同志，他们是在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认识的，在工作和战斗中相互了解和相爱的，祝贺他们结为革命伴侣。我们中央红军在陕甘宁站住脚了，在这里安了家，南方和北方红军是一家。今天是省委、省政府第一次办喜事，大家都很高兴，祝他们幸福美满。"朱开铨带着罗培兰向仲勋同志敬酒时说："感谢陕甘边区根据地的同志，给我们中央红军保留了一个落脚点，感谢你前来祝贺，感谢你给我们推荐了一批好干部，培兰同志也是你培养的好同志。敬你一杯酒，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经常打胜仗。"

岁月匆匆，百年易过。今天我们追忆"红二十六军优秀妇女干部罗培兰"（原陕西省人大副主任、刘志丹女儿刘力贞同志于2013年春题字）同志，是在追忆红二十六军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在追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

抚今追昔，更加坚定了我们早日将我国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信心。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继承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努力奋斗，让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南梁地球上的红飘带广场　　张步农　陈　明　摄

姐妹一样的情谊

——纪念罗培兰同志诞辰100周年

甘肃省华池县委党史办　折兴发

王继兰

说起罗培兰和同桂荣的友情，就像那葫芦河的水，绵绵流长。

1933年秋，年仅18岁的罗培兰逃出地主家，来到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甘肃省华池县南梁，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从事妇女工作，住在南梁寨子湾哥老会大爷高得来家的一孔窑洞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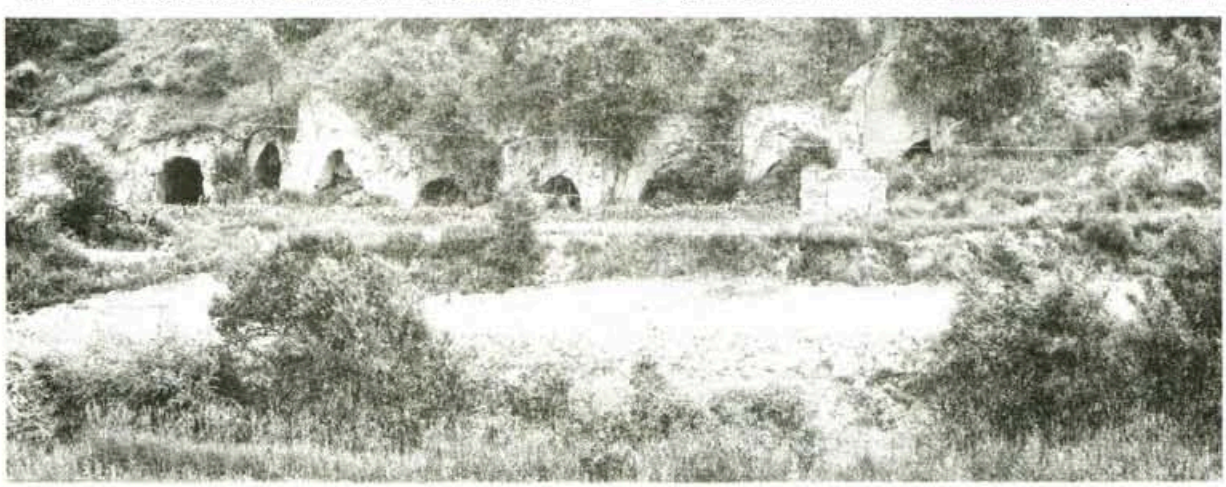
1934年2月，国民党仇良民团纠集庆阳民团谭世麟，用牲口驮着铁铡，从合水一路进剿到南梁，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到处搜捕共产党员、红军战士、赤卫队员、妇女干部、少先队员，采取撤村并户的方式，将南梁附近二将川、葫芦河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等地的农民驱赶到南梁，集中起来。还抓了南梁枪械修理所工人李青山、金岔沟农民联合会主任白养珍、牛望台农民张侯福等一大批“可疑”分子，押捕到南梁的阎家洼子村，集中审讯，轮番折磨拷打。国民党军使尽了酷刑，灌辣椒水、压老虎凳、吊绑捆打，企图从这些勇士们的口中得到红二十六军、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的消息，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勇敢、坚强的南梁儿女没有一个人屈服。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军在三天时间里先后在三个地方集中用刀砍、铁铡铡，杀害了李青山、白养珍、张侯福等6名革命干部，活埋了36名干部群众，制造了震惊陕甘边区的“四十二烈士惨案”。极其凶残的国民党军还不解恨，又奔赴刘志丹的家乡陕西省保安县金汤镇楼子沟，抓捕刘志丹的家人，捣毁了窑洞，砸碎了家什，刨挖了祖坟，扬了尸骨，杀害了3名亲人，灭绝人性。由于刘志丹的家人早有思想准备，国民党军的阴谋没有完全得逞，便四处张贴告示，到处搜捕刘志丹的亲属。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得知消息后，在请示刘志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立即组织人员，赶到楼子沟周围，才将躲在深山老林，已经饿了七八天的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妻子同桂荣、女儿刘力贞接到南梁。当时，红二十六

华池县南梁金岔沟被服厂　折兴发　摄

军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规定，凡红军战士、政府干部一律不得携带家属。刘志丹更不愿意因“情况特殊”破例、带头违犯这个“铁律”。在同志们的再三请求下，直到习仲勋将同桂荣安排到南梁红军被服厂，不再“吃闲饭”后，刘志丹才勉强答应自己的父亲、妻女暂时留下来住一段时间。心中紧绷“廉洁”这根弦的刘志丹让同桂荣母女借住进了罗培兰的窑洞。从此，两姐妹的友谊之花便绽放盛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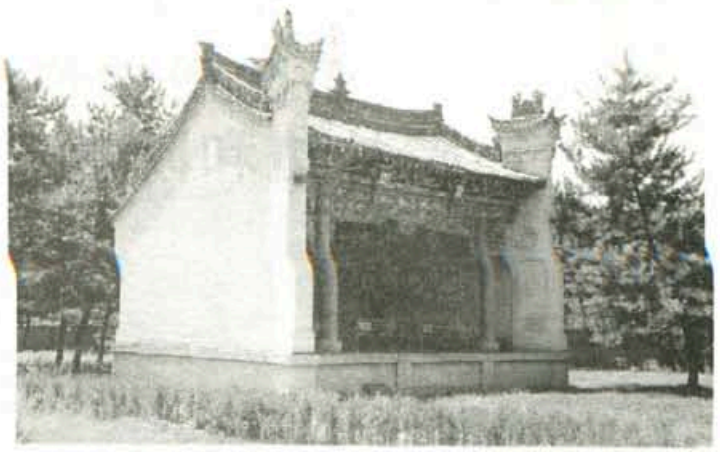
同桂荣是陕西省吴旗县九嘴坡人，出身一个大家族，从小家教很严，针线、茶饭，样样过得硬，村里庄外称得上是能手，对人热情、诚恳，特别是做得一手羊肉面，习仲勋特别喜欢吃，还让同桂荣多次做得招待过西安、延安、西峰、银川等白区来的客商。可惜她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和刘志丹结婚后，刘志丹有空只教她学会了认识自己的名字。由于刘志丹的革命工作、活动很繁忙，常常不在家，同桂荣渴望识字读书的愿望十分强烈。罗培兰是从关中北上而来的，学会写字、打枪、骑马，在陕甘边区已经很有名气。同桂荣感到她是位能文能武的红军女豪杰，钦佩不已。俩人如今住在一起，是“老天爷”的安排。她俩一见就如同亲姐妹，在寨子湾那孔小小的窑洞里，昏暗的羊油灯下，互帮互学，互相照顾。同桂荣教罗培兰学当地方言，画裁剪、缝军衣、制军旗、做袜子，搓麻绳、打褙子、纳鞋底、做军鞋，推碾子、磨面粉、炒炒面、压饸饹等针线活和饭菜，罗培兰一点一点地教同桂荣识字、写字，打枪、骑马等文化、军事知识，俩人常常一拉话就是一个半夜，一学习讨论就是一个通宵。年仅4岁的贞娃成了她俩共同呵护的小花朵。罗培兰每逢到白马庙、荔园堡等地下乡回来，总不忘给小贞娃采摘一些索牛牛、蒿瓜瓜等野果，惹得小真娃围着罗培兰整天团团转。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成立。那几天里，罗培兰被选为工农兵代表，出席选举大会。同桂荣在龚逢春、蔡子伟等的指导下，做红旗、贴标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荔园堡、白马庙设立了集市，每逢一、三、五集日，南梁街道人山人海，人欢马叫，十分热闹。罗培兰便将白马庙的惠长英、牛望台的贾朝英、荔园堡的王继兰等农村妇女积极分子先后邀请到家里，介绍



陕甘边红军干部学校旧址　　王　杰　摄

给同桂荣。同桂荣丝毫不嫌弃她们，像对待亲戚一样——热情招呼她们，给她们倒水喝，做饭吃，送鞋样，画鞋垫，裁衣服，成为亲密的好朋友。惠长英、贾朝英是刘景范、张景文培养的文艺骨干，活泼、泼辣、热情，她们编排演出的文艺节目，不但刘力贞喜欢看，同桂荣也喜欢得不得了。而同桂荣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又吸引得这些农村“小脚女人们”常常时不时地就往同桂荣和罗培兰那里跑，拉家常、诉衷肠、说想法。在同桂荣和罗培兰等的影响、鼓励下，惠长英、贾朝英、王继兰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她们的家也成了掩护革命战士、干部的“安全所”，传递情报的“交通站”。



南梁革命纪念馆清音楼　　李雪峰　摄

1935年10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搬迁到陕西省甘泉县下寺湾。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一场十分严重的“肃反”阴云笼罩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上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杨琪、张秀山、张邦英、张策等一大批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干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县级以上领导几乎全部被逮捕、关押，或活埋杀害。罗培兰是从关中投奔革命而来的干部，自然是重点怀疑的对象，随时都有遭遇逮捕的危险。那时，罗培兰看到并肩奔波、战斗的革命战友平白无辜地一个一个遭到内部同志的秘密逮捕杀害，思想上想不通，感情上接受不了，精神上压力很大，惊恐得常常夜不成眠。同桂荣在刘志丹遭受逮捕关押的情况下，依然安慰罗培兰，不要退却，不要害怕，要相信党，一切都会慢慢弄明白的。并带着小贞娃和罗培兰告别，不怕山高路远，天寒地冷，只身前往瓦窑堡，打听刘志丹的下落。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以后，“肃反”的乌云刚刚驱散，刘志丹却在奔赴东征的抗日战场上不幸牺牲。罗培兰知道后，痛苦的心情无以表达，恨不能与同桂荣相聚，当面安慰。

南梁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旧址　　折兴发　摄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39年夏，罗培兰和朱开铨已经结为革命伴侣，共同创办、（下转第14页）

听父母追忆习仲勋在陕甘边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朱新平　朱春宁　朱　红

南梁革命纪念馆全景　张步农　陈　明　摄

我们的母亲罗培兰同志，是陕西省乾县人，1934年5月参加红二十六军，就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南梁政府)做妇女工作。当时，南梁政府只有张景文、同桂荣和我们的母亲罗培兰三个女同志，从那时起我们母亲就称同桂荣为大姐。她们工作战斗生活在一起亲如一家。

母亲生前曾对我们说，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人不多，习仲勋同志是主席，白天章同志是副主席，还有三个部长，总共只有十来个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是以南梁为中心建立的，群众习惯称“南梁政府”。习仲勋同志那时只有21岁，但他在南梁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很高，是刘志丹同志派他创建南梁根据地的。他对南梁根据地的每家每户群众都很熟悉，根据地的群众称刘志丹同志“老刘”，称习仲勋同志“仲勋”。刘志丹同志率红二十六军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经常

（上接第13页）领导着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没有想到，“老天爷”又让这一对亲姐妹相逢在延安。那个时候，罗培兰任学校的总务科长，既要管理学校的后勤工作，又要抽空学习农业科技知识，夜以继日，十分操劳，经常忙得忘记了给两个小女儿做饭。同桂荣看在眼里，就把罗培兰的两个孩子朱洵、朱明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常常接到家中，管吃管住，让罗培兰安心地工作和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同桂荣又奔赴东北战场，罗培兰则随着中原解放大军南下，时间老人再次将两姐妹分隔东、南两地，但她俩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反而更加历久弥深。她俩一直书信不断，互致问候。

新中国成立后，她俩经常是你给我寄个这，我给你邮个那，礼物不断。1953年，罗培兰遭敌特暗算，无法正常上班工作，让同桂荣牵心挂念不已。她俩的革命友情也像种子一样传播到儿女们之间，同桂荣的女儿刘力贞、女婿张光与罗培兰的子女朱洵、朱明、朱亮、朱新平、朱春宁、朱小平、朱红、朱江平等的友情也像父辈们一样深厚。2013年4月，刘力贞为罗培兰写下“红二十六军优秀妇女干部罗培兰”，以表达她对这位陕甘边革命女先驱、女豪杰的永远怀念和崇敬之情。

转战南梁、陕北和照金之间，但南梁是根据地的中心，仲勋就带着我们南梁政府的十来个同志坚守，完全依靠群众，走到哪家就吃住在哪家。敌人一出动，群众就及时主动给我们报信，发现敌情转移时，南梁政府全部家当10分钟就可以装进马褡子，放在两个毛驴背上就走。仲勋同志说："在南梁打游击，我们要走就能走，要打就能打；走的时候，碎纸片和其他不是老百姓用的东西，都要拾掇干净。落下来东西被敌人发现，房东就要遭罪，我们千万不能叫群众受牵连。"

随着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展扩大，1934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节那一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刘志丹同志任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同志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边区政府有土地、肃反、财政、经济和粮食委员会，政府工作人员约有30人，在根据地建立了各级农会、工会、赤卫军、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组织。从南梁政府二个毛驴驮全部家当的三个部初创时期，进入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扩大发展时期。仲勋同志对我们说："陕甘边根据地还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发展，我们进行的是土地革命，只有正确执行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才会拥护我们。边区政府的每一个同志，都必须听懂政策、掌握政策，才能正确执行政策。做群众工作时，一个村子、一户人家都不能落下。要一家一户宣传和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没有红军根据地就保不住，没有根据地红军就没有依托、就没有家、没有后方。建立根据地扩大红军都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只要紧紧依靠群众，我们陕甘边区根据地和红军就能发展壮大。"当红二十六军打下城镇乡村时，仲勋同志带领我们一家一户做工作，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发展积极分子，建立革命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动员群众参加红二十六军，起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巩固和发展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培养一批军政干部，在南梁成立了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同志任校长，习仲勋同志任政委，马文瑞同志任教员，我那时是学员之一。仲勋同志亲自给我们讲课，在讲到党的政策时，特别强调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他说："对根据地群众开展工作，最主要的是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一家一户做工作，一家都不能拉下。调查土地改革分配的情况，分配要做到公平合理。通过土地革命，从宣传群众到组织群众，条件成熟时就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对红军家属开展工作时，要鼓励他们坚定信心，支持红军和边区政府。了解他们的困难，及时解决。帮助他们孝敬老人、抚养子女，动员他们做军服、军鞋、加工军粮。支持在红军中的亲人，不拉后腿。对军烈属要优待，没有劳动力的由边区政府养起来。对可能被争取转化的人开展工作时，对他们的家属要经常宣传、争取和教育，详细了解他们的各种情况，生活困难的要适当接济。"仲勋同志在讲到处理紧急情况的工作方法时说："发现敌情或发现问题，首先情况要调查清楚，再仔细分析，及时报告上级，在来不及报告上级的紧急情况下，要一面处理、一面上报。要根据实际果断处理紧急情况。"经过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我们的政治军事水平和文化知识都有很大提高。陕甘边区根据地是不断扩大的游击区，与敌占区犬牙交错。我们在工作中经常发生与敌人突然遭遇的情况，就用上了

在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学会的军事知识，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

1935年秋，中央红军快到陕甘边区根据地之前，仲勋同志布置边区政府做好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工作时说："党中央率中央红军快到我们根据地了，我们现在就要做好迎接准备工作。中央红军是南方来的同志，我们西北地区天寒地冻，他们生活不习惯，要动员群众做好准备，不能冻着他们，要让中央红军来了有热炕睡、有热水喝、有热饭吃。特别要做好保密工作，对敌封锁消息。我们边区政府的各级政权组织都要负起责任来。"但是，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一批领导干部还未能亲自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就被"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派人抓起来了。当时正是敌军对陕甘边区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紧急关头，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根据地县以上干部全部被关押，有二百多好同志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被肃反扩大化错杀了。整个根据地人心惶惶，群众看见穿红军军装的都躲，听见讲外地口音的红军就跑开，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我能幸免此难，是仲勋同志救了我。我刚从游击队排查工作回到边区政府，仲勋同志就赶紧把我拉到一边，急急地对我说："你赶快到群众家里去，把公家的衣服换掉，赶快跑。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千万不能跑到白区那边去，将来回来还可以说得清楚。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将来回来就什么都说不清楚了。"我说："我们大家一起跑。"仲勋同志说："他们已经包围边区政府，你刚回来，他们搞不清楚，再不跑就来不及了。大家一起跑，谁都跑不了，你是女同志，容易跑出去。"我就到群众家换了老百姓衣服，跑到游击队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边区根据地，我带游击队参加中央红军组建的陕甘省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后来就分在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工作。

中央红军刚到吴起镇，毛主席了解到刘志丹等一批军政领导干部被错误关押，并有一批干部被错杀，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等待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同志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解救幸存的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军政干部。当时根据地的干部群众看到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军政干部被解救出来了，都唱着："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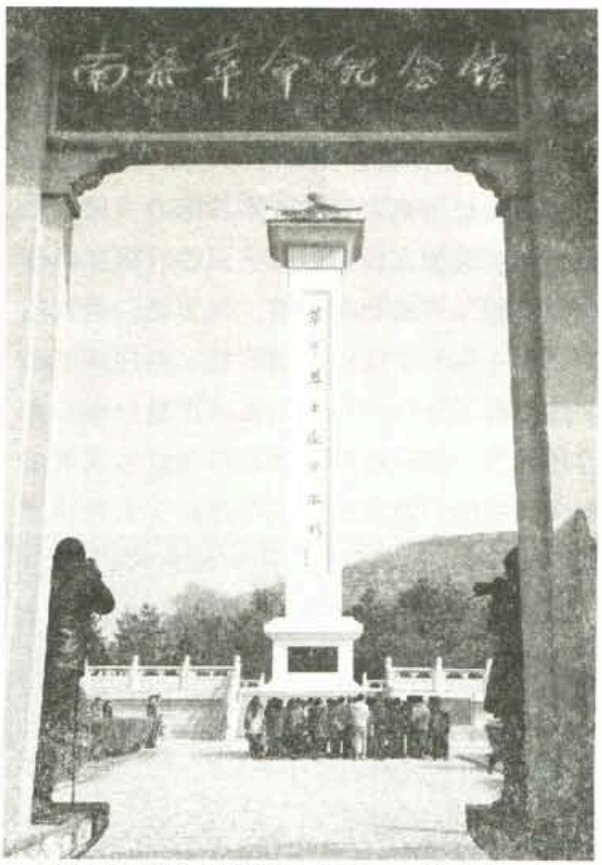
仲勋同志出来见到我说："是党中央毛主席挽救了陕甘边区根据地。再晚几天，老刘和我都会被他们活埋，中央红军不来，根据地也会被他们搞垮。今后，我们陕甘边区的同志，要一心跟紧党中央毛主席，任何时

今日南梁　　张步农　陈　明　摄

候都不能有二心。”

在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里，中央红军来的同志对西北话听不明白，他们讲的南方话，根据地的群众又听不懂，群众信任我们陕甘边区政府来的同志，我们就做翻译。我们告诉根据地的群众：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中央红军，中央红军是为根据地反第三次“围剿”打仗。支前工作团的工作很快就顺利展开，组织了数百人的运输队、向导队和担架队，完成了及时运输军需给养、带路和转运伤员的任务。整个根据地对敌军封锁消息，我们陕甘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唱到，“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亲人迎进来”，生动地再现了陕甘苏区军民在直罗镇战役中支前拥军场面。群众帮助隐蔽红军部队，敌军根本不知道红军主力部队就隐蔽在直罗镇附近。群众还帮助传递敌人动态情报，坚壁清野。陕甘边区根据地在家的青壮年不多，有的军烈属家中只有老人妇女儿童，仍然踊跃参加支前工作。宁愿自己受冻，也把仅有的被褥给伤员盖上，有的群众把自己的口粮都献给红军。毛主席在总结直罗镇战役胜利的经验时指出：没有群众与我们一致，则隐蔽主力、搬运伤员、供给粮食都不可能做得这样好。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是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奠基礼。

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是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基础上扩大的，受到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影响，缺少干部，影响工作迅速开展。当时，你们的父亲朱开铨同志是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仲勋同志向他移交工作介绍敌情、推荐干部。他们初次见面谈了两天工作。你们的父亲长征途中负过伤，在直罗镇支前工作中连续三天没睡觉，战役一结束就累病了，陕甘省委派我护理他。仲勋同志问我：“听马锡五同志说，给你介绍了一个中央红军的同志，叫什么名字？人怎么样？”我说：“是朱开铨同志，在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认识的。现在是省政府主席，就是他接收了我们陕甘边区政府的干部。中央红军来的罗梓铭同志也要我和朱开铨同志结婚。”仲勋同志说：“是朱开铨同志啊！我们已经见过面了，他现在累病了，你要照顾好中央红军来的同志，他们长征吃了很多苦。他对你好，那就可以考虑。”我说：“我还要看一看这个人到底怎样，组织派我护理他养病，我会处理好的。”仲勋同志第



南梁革命纪念馆烈士纪念碑　　折兴发　摄

二次来时，陕甘省扩大为陕甘宁省。仲勋同志又对我说："朱开铨同志在工作方面信任和使用陕甘边区的干部，我看他坚持原则、为人正派，你同意与他结婚就向省委汇报。"仲勋同志说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当时陕甘宁省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省政府主席是马锡五同志，你们的父亲任省委委员、省政府党团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兼土地部长和裁判部长。我向李富春同志汇报，同意与朱开铨同志结婚。很快，李富春同志代表省委批准我们结婚，并把马锡五、罗梓铭、肖劲光、李一氓、蔡畅请来，商量办喜事。你们的父亲自己花两块银元办了三桌酒。李富春同志主持婚礼，并代表省委、省政府讲话；罗梓铭同志代表中央红军来陕甘宁省工作的同志讲话，马锡五同志代表陕甘边来陕甘宁省工作的同志讲，蔡畅同志代表妇女同志讲，肖劲光同志代表驻陕甘宁省的红军部队讲话。习仲勋同志赶来祝贺，李富春同志祝酒时说："朱开铨同志和罗培兰同志，是陕甘宁省第一对结婚的同志，他们是在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认识的，在工作和战斗中相互了解和相爱的，祝贺他们结为革命伴侣，我们中央红军在陕甘宁站住脚了，在这里安了家，南方和北方红军是一家。今天是省委、省政府第一次办喜事，大家都很高兴，祝他们幸福美满。"你们父亲向仲勋同志敬酒时说："感谢陕甘边区根据地的同志们，给我们中央红军保留了一个落脚点，感谢你前来祝贺，感谢你给我们推荐了一批好干部，培兰同志也是你培养的好同志。敬你一杯酒，也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经常打胜仗。"

"鸡娃子叫喊，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这是南梁根据地群众迎接"老刘"、"仲勋"同志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唱的歌，我一想起这首歌就禁不住热泪盈眶，就会想起刘志丹同志和习仲勋同志领导我们创建南梁根据地的艰苦岁月，就会想起战火纷飞的陕甘边区根据地的日日夜夜，仲勋同志教导和关心我的情景就会再现脑海，久久不能忘怀。

1985年11月中旬，习仲勋同志到江西视察工作时，专程前往江西省人民医院干部病房，看望我们的父亲朱开铨同志。当天下午，父亲告诉我们："习仲勋同志代表党中央到江西视察工作，今天上午专程到医院来看我。他一见面就说，开铨同志，你好，50年前中央红军长征到陕甘边根据地，是党中央、毛主席挽救了陕甘边根据地，也挽救了刘志丹和我，挽救了陕甘边一批同志，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你是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还有罗培兰同志，是我们南梁政府成立时三个女干部之一，我们在陕甘宁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王　杰　摄

边区共同工作、战斗，解放战争分开到现在，我一直都记得和你们在一起的情景，这次来江西就很想见到你们。”父亲又说：“我和习仲勋同志有20多年没见过面了，谈到陕甘边、陕甘省、陕甘宁省和陕甘宁边区在一起的往事，不知不觉就谈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医院喊开饭时，习仲勋同志才向我告辞。”

父亲还给我们讲了一段革命的经历：我们中央红军长征到吴起镇，党中央毛主席就了解到，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执行“左”倾错误路线，在陕甘边根据地搞肃反扩大化，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军政干部，并已错杀200多人，党中央毛主席立即命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等候中央处理。”党中央毛主席为粉碎国民党对陕甘边根据地第三次“围剿”，准备进行直罗镇战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也为了纠正“左”倾肃反扩大化，制止继续错杀干部，决定撤销陕甘晋省，成立陕甘省和陕北省。我在红三军团，部队正往直罗镇方向运动，王观澜同志守候在甘泉县下寺湾的路口，他大声叫：开铨同志停下来，不要走了。中央决定撤销陕甘晋省，成立陕甘省和陕北省，毛主席提议你任中共陕甘省省委委员、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兼土地部长和裁判部长，负责筹建省政府，主持省政府的工作。因为中央要培养当地干部，省政府主席由当地干部担任，要搞好团结，陕甘边苏区是全国唯一没有丢失的根据地，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我们中央红军人生地不熟，要团结和依靠陕甘边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做好直罗镇战役的支前工作。我立即赶往中共陕甘省委报到。当时筹建和主持陕甘省政府的第一个中心任务，就是组建陕甘省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持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进行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的干部里，从中央红军来的较少，大多是原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党政干部，主要是依靠他们帮助。我们中央红军来的干部与群众的沟通，动员群众，组成了运输队、向导队、担架队，开展筹款、征粮、运粮、收集敌情、肃清敌特、封锁消息、隐蔽部队、转运护送伤员等后勤工作。我们刚到西北语言不通，但有陕甘边的干部共同工作，就像在中央苏区。群众觉悟普遍很高，根据地的基础工作扎实。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动员群众支前，老百姓二话不说，放下手上的活就跟我们走。刘志丹、习仲勋同志培养的边区干部作风好，工作能力强，刘志丹和习仲勋同志深得民心，保密工作做得好，中央红军主力大部队隐蔽在群众家里，敌人就是发现不了。部队战前得到充分的休整，提高了战斗力。毛主席在直罗镇战役总结中高度评价陕甘省的支前工作。

中央红军刚进入陕甘边根据地时，我就看到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署名的布告，在支前工作中又经常听到群众对习仲勋同志的好评，能和刘志丹同志齐名得到陕甘边根据地军民的拥护，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习仲勋同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西北地区，自然条件比南方差，地旷人稀，敌强我弱，历经挫折和失败，经过多次的武装起义，刘志丹、习仲勋同志带领红二十六军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实属不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唯一能坚持下来的革命根据地更是难能可贵，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保留了一个落脚点。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的同志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

1935年12月初，毛主席夜晚赶到陕甘省，对我说："你给我找个向导，我到省委听完汇报后，就要回瓦窑堡。"我立即找陕甘边来陕甘省政府工作的罗培兰同志，要她赶快找一个可靠的向导，为毛主席带路，连夜就出发去瓦窑堡。

我随即向毛主席汇报陕甘省政府的工作，我劝毛主席住一夜再走。毛主席说，现在情况很紧急，很像中央苏区肃反，这里的肃反搞得也很厉害，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军政干部都抓起来了。这完全是错误的，我要赶回瓦窑堡去处理。

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是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基础上扩建的，主要干部因"肃反"被关押，还有些干部躲在外面不敢回来，缺少干部的问题尤为严重。这时，习仲勋同志被解救出来，他向我移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向我推荐了一些忠诚可靠、作风正派、革命立场坚定、群众关系良好的当地干部。我根据习仲勋同志推荐的名单，出面去要，带公文到有关部门交涉，派人去找。听到习仲勋同志回来了，那些躲藏避难的同志也陆续回来了，被关押还幸存的干部也回来了。我鼓励他们安心工作，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在纠正错误的肃反扩大化。基本上按习仲勋同志的意见安排了工作。那时朱理治同志任陕甘省委书记。我安排杨玉亭同志任省政府粮食部长，他要我同意把杨玉亭、席仲琪同志抓起来。事关重大，我立即派人把省保卫局长郑自兴同志、少共省委书记揭俊勋同志找来，他们说是省委书记朱理治同志决定要抓杨玉亭、席仲琪同志，省保卫局没有掌握任何证据。我耐心地对他们说，我们从中央红军到中共陕甘省委工作，都是省委委员。我对朱理治同志决定逮捕杨玉亭、席仲琪同志这件事，提几点个人意见。1、党中央毛主席派我来陕甘省的时候，再三强调要团结当地干部，依靠当地干部站住脚，巩固和发展根据地。2、撤销陕甘晋省是党中央毛主席采取的组织措施，其中也有制止错捕错杀，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的作用。3、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重大事情都要经过省委集体开会研究，不许某一个人独断专行。现在李富春、肖劲光和李一氓同志都没有到，朱理治同志个人的决定不能代表省委。4、我已向原陕甘边的马锡五、李培福和谢怀德同志调查过，杨玉亭、席仲琪同志都是红二十六军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同志，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如果凭朱理治同志一句话就逮捕他们，是会犯错误的。如果错捕他们，今后怎样向党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王　杰　摄

中央交待，怎样向陕甘省的党员干部群众讲清楚。5、省保卫局抓捕人犯，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审查干部要执行党的政策，不搞逼供信，防止灭口和意外身亡。既要提高警惕，又不能疑神疑鬼。郑自兴、揭俊勋同志表示赞同我的意见。省保卫局没有执行朱理治同志逮捕杨玉亭、席仲琪的决定。

习仲勋同志知道这件事后，特地到陕甘省政府，感谢我们对陕甘边苏区干部的信任。我说："毛主席亲自交待，要团结和依靠陕甘边的同志，从直罗镇战役的支前工作中，我就体会到陕甘边根据地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就像我们在中央苏区一样深厚，陕甘省的支前任务主要就是依靠陕甘边的干部配合我们中央红军来的同志组织动员群众完成的，我们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表彰，也要感谢陕甘边的同志。陕甘边的同志坚持斗争、浴血奋战，为中央红军保留下陕甘边根据地，我们更要感谢你们。"

在陕甘省和陕甘宁省工作期间，对习仲勋同志的情况了解的更多，仲勋同志是陕甘边根据地创始人之一，陕甘边根据地的创立经过多次反复，牺牲了很多同志。仲勋同志领导两当起义，为创建根据地出生入死，负过伤。刘志丹和习仲勋同志总结政治、军事上的经验教训，决定走井冈山道路，根据陕甘边的实际情况，开始了许多独创性的探索工作，终于成功地从单纯兵运工作转向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组织群众进行土地革命。陕甘边根据地制定和执行的土地政策和中央苏区很相似，军事上采用游击战、运动战，战术上灵活机动，部队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大，创建了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根据地，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把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根据地范围有20多个县。就在此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执行者在陕甘边搞肃反扩大化，关押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军政干部，党中央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到陕甘边根据地，解救了他们。仲勋同志出来工作后，见到陕甘边的干部就鼓励他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要振作起来，坚定革命信念，不要有抱怨情绪，要顾全大局，严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分配，努力工作，为实现党的目标奋斗。

我在陕甘省和陕甘宁省工作期间，经常向仲勋同志了解情况，他对陕甘边根据地的敌我情况了若指掌，介绍敌情具体明细，如何防备马匪骑兵，如何防土匪赵老五。介绍干部队伍情况，不带个人倾向，实事求是。我感到他在干部群众中很有威望，有号召力，胸怀宽广，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政治水平很高，顾全大局，作风正派，党性很强，任何时候都能把党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样，我同仲勋同志相处就更亲近了。只要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留他住两天是经常的。你们的母亲罗培兰同志就是南梁政府的，仲勋同志还是他的老领导，我们在一起都很愉快。抗日战争时期，我到陕甘宁边区巡视团当主任，在延安和你们大姨同桂荣(刘志丹同志夫人)同志是邻居，就住在边区政府上面的一排窑洞里，仲勋同志也经常来我们家。我是解放战争南下到江西的，但是我在陕甘宁边区工作近13年，与习仲勋同志建立的革命友谊把我们永远联系在一起了。

从父母的回忆中，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我们要向革命前辈学习，把党和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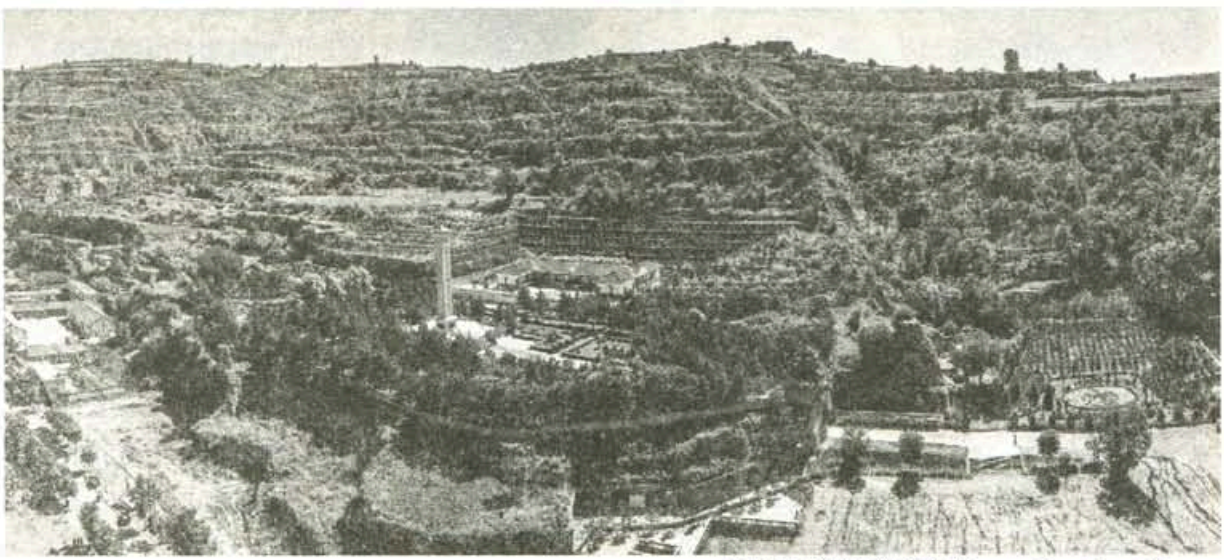
怀念我的姨妈

唐　林

我的姨妈、老红军罗培兰是个谦虚、慈祥、受人尊敬而又平易近人的人，她为中国革命，为党，为人民，为共和国的建立付出了很多贡献，立下了很多功勋，却从不居功自傲。离休后，就与平常人一样地居家过日子，但老红军、革命家的优秀品质却时时在她的平凡生活中闪现。

文革后期，我初中毕业，没有工作，就住在姨妈家，这是栋老房子，四面透风，靠近大路边，居住环境不是很好，夏天蚊虫、老鼠成群，冬天寒冷时取暖需烧木炭，洗澡用大锅烧水，周边很多老同志恢复工作后向组织申请到了新房，有些已经搬家走了。我的姨夫、老红军朱开铨同志文革后重返工作岗位，这时正在省政法办工作，以他们二老资历、条件要求组织上给分配一套较好的住房应该不是难事，我也常在姨妈身边吹吹风，建议姨妈向省有关单位反映困难，要求改善住房环境，但是姨妈总是轻轻地摇摇头，慢慢地说："组织上也有难处呀！""这房子虽说是旧，但是还能住人，现在有很多人连这样的房子都住不上，很多单位、工厂都没有钱盖不起新房，我们能住上这房子，能遮风挡雨就可以了，老干部要带好头，不能搞特殊化呀。"二老决不向组织上提出个人要求，这套老房子姨妈家一住就是近二十年。现在每当我办事路过省政府大院，看到当年姨妈家住过的那套老房子时，姨妈那慈祥、和蔼的笑容就会久久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建国初期因敌特的迫害，姨妈的腿伤残了，行动很不方便，以致后来患上肺心病，遭受了许多疾病的折磨。有一年（1972年）我住在姨妈家时，冬天姨妈犯病了，家中只



鸟瞰南梁革命纪念馆　　王　杰　摄

有我在（表哥、表姐们都在外地工作，部队当兵），我就去医院陪护姨妈。姨妈住院时，处处都对自己要求很严，尽量地不麻烦医生、护士们，很主动地配合治疗，决不提出哪怕是合理的要求，甚至病房里扫地、拖地常是自己做，医院里的医生、护士都非常尊敬、喜欢她。姨妈住院期间时常惦记在医院治病的老同志们，常常去看望他们，与他们谈往事、谈现今、谈治病、谈健康，姨妈在住院治病期间被疾病折磨地非常痛苦，但有几十年革命斗争磨砺、具有乐观主义心态的姨妈不怕病痛，藐视病痛，在疾病面前始终泰然处之，深受医生、护士们的敬佩。到医院治病的老同志比较多，高干病床不够用，走廊上架起了临时病床，住院部的走廊顿时显得很拥挤，还未痊愈的姨妈询问护士得知了此事，第二天姨妈轻声地对我说："走，咱们去办理出院手续，准备回家。"我不解地问："姨，与家里商量了吗？"姨妈慢慢地说道："有这么多的人没有床位，住在走廊上，这些得重病的老同志更需要病床，需要得到及时地治疗呀！医院也有医院的难处！我这是慢性病，短时间不要紧，可以再拖一下。"当天我陪着姨妈办了手续，出了医院，回家中继续治疗。

姨妈的腿很不方便，很多行动都受到限制，但是姨妈又是个闲不住的人，家里家外都很忙，常常要去探望许多离休老同志、老战友们，或常到外面锻炼身体，四处去走动，但在那个年代（七十年代后期）为离休

奔南梁　李雪峰　摄

老干部提供服务的设施很有限，姨妈要去医院或外出办事，只要口头提出申请就可得到专车使用，但实际情况常常是需要用车的老同志有很多而车辆少，不够用，有关部门往往是无车可派，姨妈的很多外出行动受到影响。我的大表哥就给姨妈买了一辆三轮自行车专供她外出使用，从此我就常骑着三轮车带上姨妈外出，去探望老同志、老战友，带上姨妈去市场、去公园，姨妈想去哪里我就骑三轮车带她去哪里，我深深感觉到在那段时间姨妈非常开心，她总是乐呵呵的，那个时候除了去医院看病要用专车外，姨妈再也没有向有关部门申请过专车，姨妈常念叨着说："现在可好了，行动自由了，可以不麻烦组织上了，离休了，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有什么困难应该自己解决，不能常给组织上找麻烦，专车应让那些更困难的老同志们去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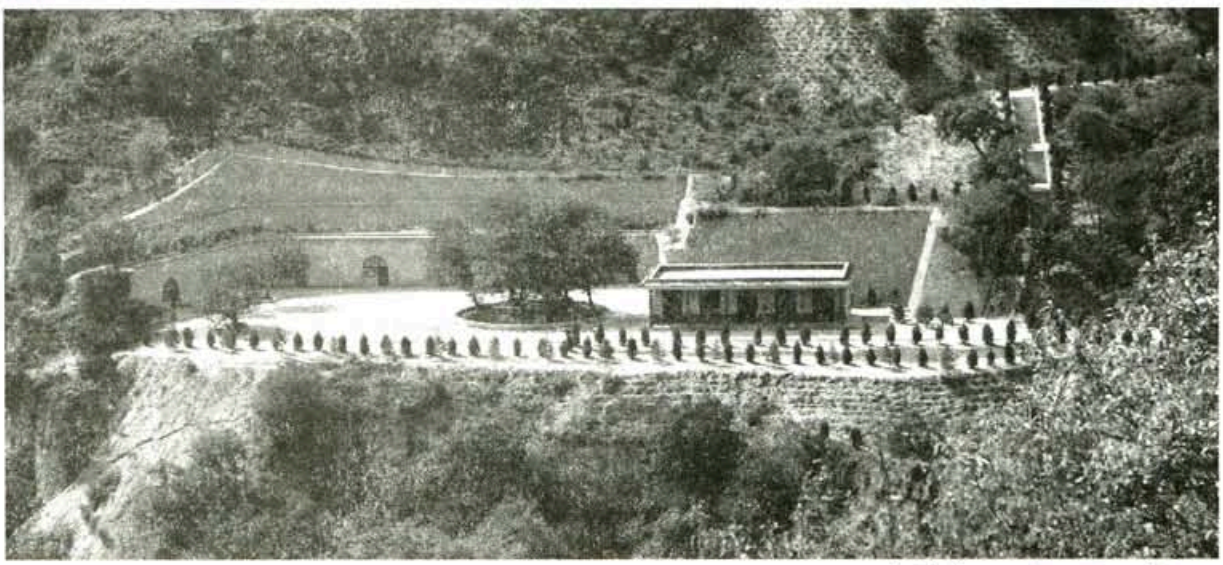
姨妈不但严格要求自己，对亲人，对儿女也是严格要求，姨妈、姨夫他们从不因子女的事情向组织上提出特殊要求。姨妈的大儿子、我的大表哥参加工作就在某器材厂做

一名普通工人，每天三班倒，常有晚班，一干就是十年。二表哥、三表哥、四表弟们全都参了军，在基层连队做普通一兵，复员后又全安置在工厂做工人。记得有一次二表哥在车间工作时不慎吸入有毒气体，病倒了，在家恢复期间向爸、妈提出，想换个好单位，改善一下工作环境，请爸、妈出面找关系时，我姨妈、姨夫当时就表态说："工厂的工作都是需要人来做的，别人能做，你为什么不能做？你为什么要搞特殊呀！"姨妈、姨夫没有答应二表哥的要求，始终没有为此事去找组织，也没有为此去拉私人关系。1980年因家中困难，经大表哥介绍我调入南昌市一个建筑公司做了一名建筑工人，在这又苦又累的十年中，我多次想向姨妈或姨夫提出调换工作单位的要求，每当有这念头时，我就先与母亲商量此事，母亲总是说："做人要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不要三心二意，"而姨妈、姨夫教育二表哥所说的："别人能做，你为什么不能做，你为什么要搞特殊？"常在耳边响起，于是重新振作起来，要争这口气，始终坚守在建筑工人的岗位上工作了十年。

姨妈的生活很简朴，从不讲求物质享受。每当姨妈吃着我母亲做的带有家乡风味的面条或家乡的葱油饼时，也就是姨妈最开心的时候，姨妈最享受的时候。很多事情姨妈都不求人尽可能自己解决，还经常自己织毛衣，自己洗内衣裤，自己整理家务，一件汗衫补丁落补丁，都是自己用针缝上的，汗衫变成了夹衣还在继续穿，但却总是干干净净的，姨妈任何时候都把自己梳洗得干干净净，把房间整理的有条不紊，直至姨妈她老人家最后的日子都是如此。

我的姨妈就是这样的人，她总是把方便让给他人，把困难留给自己，遇事总是想到组织上有困难，我不能麻烦组织。从不居功自傲，甘做一个普通人，不讲求享受，过平凡的生活。我十分怀念我的姨妈，更敬仰姨妈哪崇高的品德。能有这么好的姨妈，这辈子我永远感到自豪、骄傲！

2015.12.1于南昌



寨子湾　　折兴发　摄

罗培兰同志生平

罗培兰，女，（1915年9月16日——1995年12月12日），陕西省乾县注泔乡胡罗村人。

1934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秋，参加红26军解放合水县的战斗。

1934年2月至1935年10月，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南梁政府）妇女代表，从事妇女工作。

1935年初，任富甘县妇女主任。

1936年5月至1937年9月，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四科科长。

1937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巡视团干事。

1938年6月至12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副科长。

1939年1月至1945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总务科长。

1945年9月至1947年，任陇东专员公署四科科长，中共陇东地委委员兼庆阳县县长，中共七大代表。

1947年11月，到中央土改训练班学习。

1948年4月至1949年1月，在河北西柏坡中央组织部待命南下。

1949年1月至5月，在中原人民政府军管处工作后南下。

1949年5月至1952年底，任江西省宁都专署民政科科长、兼任人事科科长。

1953年初，在江西省民政厅工作。

1955年1月，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1966年，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

1971年11月，以副厅级干部办理离职休养。

1995年12月，为江西省政府办公厅离休老红军、老干部。

纪念罗培兰同志的悼词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红军、省政府办公厅离休老干部罗培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5年12月12日3时36分在南昌逝世，终年81岁。

罗培兰同志1915年9月出生于陕西省乾县注泔乡胡罗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4年2月加入共青团，1934年5月参加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26军，在军部从事后勤供给工作，1934年6月奉调陕甘边区最高临时政权——陕甘区革命委员会（后改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又称南梁政府），在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任南梁政府女代表，负责妇女工作，1934年8月——11月在刘志丹同志任校长，习仲勋同志任政委的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轮训；1934年11月被选为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出席了陕甘边区工农

兵代表大会；1934年12月——1936年5月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四科科长；1936年9月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36年5月——1937年9月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四科科长；1937年9月——1938年6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巡视团干事；1938年6月——1938年12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副科长；1939年1月——1945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总务科长；1945年9月——1947年3月任陇东专员公署四科科长，1947年11月——1948年4月在中央土改培训练班培训；1948年4月——1949年1月在中央组织部待命南下；1949年1月——5月在中原人民政府军管理处工作；1949年5月——1952年底在江西省宁都专署任民政科科长、兼任人事科长；1953年初调江西省民政厅工作遭潜伏特务医生暗害，身体致残，个人生活不能自理；1971年11月正式办理退休手续，1981年离职休养。

罗培兰同志年幼丧父，少小离家，倍受旧社会剥削和压迫，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2年3月，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创建了西北地区唯一的苏维埃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并相继组织和发动十多次武装起义，罗培兰同志很快地接受了党的影响，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于1934年2月毅然加入共青团，积极开展地下斗争，1934年5月策应红26军发动合水兵变，并和起义部队一道加入红26军，从事供给工作，1934年6月在陕甘苏区最高临时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任妇女代表，她和刘志丹同志夫人同桂荣同志，是南梁政府仅有的二名红军女干部，在此期间，她不怕艰难，不畏牺牲，积极投入陕甘边区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扩大与巩固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筹粮筹款，进行土地革命等项工作，经历了陕甘地区根据地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战斗的严峻考验。为迎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地区，为陕甘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35年10月，受错误的肃反扩大化的迫害，刘志丹、习仲勋等400多名红26军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被错抓，在错杀了200多名领导干部的危机时刻，党中央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边区根据地，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幸存的200多名领导干部，罗培兰同志才得以幸免于难。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在陕甘宁省支前工作团工作，协助蔡畅同志深入各县建立党的工作委员会，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妇女投身革命、提倡妇女识字，争取男女平等，反对恶霸，清除汉奸，组建了“庆阳县各界民众抗日救国联合会”、“妇女救国会”等抗日组织，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在陕甘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协助朱开铨同志创办了

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为生产自救、反对经济封锁培训骨干，为巩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受到了边区政府的表扬。她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解放战争时期她协助朱开铨同志做好了中原人民政府荣军管理处的工作，体现了共产党员高度的责任感，为完成淮海战役五万伤、残军人转运和安置的艰巨任务，冒着国民党散兵、特务不断偷袭的危险，指挥中原军区开封兵站、医护人员、警卫部队、支前民工，日以继夜、任劳任怨完成淮海战役的善后工作，稳定了军心，有力的支援了大军南下，受到了中原人民政府邓子恢主席的表彰。南下江西在宁都专员公署工作期间，因缺乏干部，她身兼两职——人事科长、民政科长。在宁都专区参加了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土匪的斗争，参加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接管、改造，为在宁都地区建立新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作了大量工作。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基层组织和开展剿匪反霸和土改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她协助朱开铨同志筹建宁都烈士子第学校，代表党和政府寻找烈士遗孤，发扬延安精神，组织干部、教师、烈校学生边劳动边建校边学习，培养了赣南八县的烈士遗孤，继承先烈革命遗志，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她在分管人事工作时，曾几次将调级调资指标让给其他同志。她在宁都专署工作期间，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吃苦耐劳，为宁都专署的干部队伍建设和加强当地的军政军民团结，促进经济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3年调江西省民政厅工作时，因病遭国民党潜伏特务医生毒害致残，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但她身残志不残，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心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文革”受迫害最困难的时候，她教育子女，无论遭受什么迫害都要相信党，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1981年她离休后，仍然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江西的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就在她逝世前的一个月，还特别要求乘车参观南昌市的城市建设，她看到江西近几年经济建设的巨大变化和迅速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

她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她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罗培兰同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老红军、老干部，在她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她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她无论是在大西北还是南下到江西，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默默奉献，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不怕苦、不怕死。她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团结同志，平易近人，她对子女要求严格，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坚决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支持省委、省政府的工作。

罗培兰同志虽然逝世了，但她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革命品质和坚定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象她那样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科技进步，文化昌盛，社会稳定，生活小康的江西而努力奋斗。

罗培兰同志，安息吧！

赞罗培兰

能文能武女红军，
亦使亦师好战士。

古时花木兰替父从军戍边安疆，
今日罗培兰助夫革命西拼南搏。

（折兴发　撰）

罗培兰

折兴发

少年丧父身抵债，
南梁闹红民喜爱。
革命建设好人才，
敌特暗算志常在。

南梁军民迎接中央红军　　李雪峰　摄

1939年1月至1945年9月，罗培兰同志任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总务科长时的照片。

1948年4月，罗培兰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待命南下时和两个孩子的照片。

1940年2月，朱开铨同志、罗培兰同志和孩子与庆阳县政府及庆阳专署同志们的合影。

1982年，罗培兰的表哥（右一）与舅妈（左一）在罗培兰旧宅前的合影。（赵建林　提供）

1945年5月至1952年底，罗培兰同志任江西省宁都专署民政科长兼人事科长时的照片。

1982年，罗培兰的女儿朱红（二排左三）与女婿李建（二排右一）和舅妈（二排左四）、舅舅（二排左五）在罗培兰旧宅前的合影。（赵建林　提供）

南梁史苑

Nan Liang Shi Yuan